

# 實現制度創新突破 服務國家現代化建設



明年就是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古人講「三十而立」，立的是根基、是方向、是足以支撐長遠發展的框架。特區政府選擇在這個時間節點推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並展開公眾諮詢，本身就有深遠的象徵意義。香港五年規劃宜將香港與內地的制度差異轉化為香港服務國家的「制度溢價」，將國際通行規則轉化為內地可資借鑑的制度經驗，將內地的制度需求轉化為香港的服務供給，使香港服務國家的能力實現質量的提升。

紀緯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諮詢文件劃分為六個範疇，涵蓋北部都會區、經濟金融貿易、創科產業、民生社會、區域合作及文體旅綠色生活，布局全面，方向清晰，直接決定香港能否以「三十而立」的姿態，在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戰略框架下，真正實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服務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使命。

回歸近30年，香港經歷了風雨洗禮，也積累了豐富的治理經驗。但不可否認，過往不少長遠願景未能貫徹始終，根源在於規劃與執行之間缺乏有效的制度銜接機制。香港五年規劃的提出，就是通過「規劃定方向、施政定重點、預算定資源」，為發展構建起堅固制度保障，其真正價值在於將規劃從「願景清單」轉化為具有連續性和約束力的行動綱領，確保它不因政府換屆而中斷、不因部門壁壘而被架空；這是香港從「三十而立」走向「三十而邁」的關鍵一步。唯有在制度層面完成從被動應對向戰略牽引的範式轉移，香港才能以更穩健的步履踏進下一個30年的征程。

## 建構發展底座

編制香港五年規劃的最終目的，是為香港的持續改革與長遠發展構建穩固的底座。這個底座應包含三個維度：第一，完善橫向的跨部門協作機制，確保北部都會區、創科產業、土地房屋等

跨領域議題不會因部門壁壘而寸步難行；第二，落實縱向的規劃實施問責機制，結合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將五年目標分解為年度指標，納入公務員績效考核和主要官員問責範疇；第三，打造外向的持份者參與機制，吸納商界、學術界、專業界別和社會各界對規劃實施進行常態化監督與反饋。這三個維度共同構成一個能夠因應外部環境變化而自我調整的有機體系，帶出制度韌性的特徵。當制度底座足夠穩固，香港便能在風高浪急的外部環境中保持戰略定力，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行穩致遠。

## 創造制度溢價

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融入」與「服務」是國家對香港在新時代的角色定位，也是香港必須回答的時代命題。融入不是簡單的跟隨，服務也不是被動的配合，而是要求香港在制度層面展現出更強的建構性和主動性。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編制過程，本身就體現了這種主動對接的精神。然而，如果沒有制度化的對接機制，這種協作便難以持續。特區政府須與國家「十五五」規劃進行對接、與中央部委進行各種專項溝通、與廣東省及大灣區其他城市對接並作季度協調，建立常態化的制度安排，使「融入」與「服務」從口號轉化為可操作、

可檢視的治理流程。

香港五年規劃宜將香港與內地的制度差異轉化為香港服務國家的「制度溢價」。香港的獨特優勢在於「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體系和高度國際化的制度環境。過去一段時間，兩地制度差異往往被視為融合的障礙，許多人擔心規則銜接難、機制對接慢。但換一個角度看，香港的國際規則對接能力，恰恰是國家在制度型開放進程中最需要的「公共產品」。國家「十五五」規劃強調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這方面，香港完全可以成為「國際標準規則的轉換器」，將國際通行規則轉化為內地可資借鑑的制度經驗，將內地的制度需求轉化為香港的服務供給。要實現這一角色轉換，制度保障必須先行，可考慮首先在河套、前海等節點探索並深化規則共享的試驗機制，在法律服務、知識產權、數據跨境等領域建立更靈活的制度對接通道。當制度差異不再是障礙而成為價值來源時，香港服務國家的能力便可實現質量的提升。

香港正處於外部環境劇變與內部瓶頸交織的關鍵節點。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編制本身就是一次歷史性的制度突破。做好五年規劃的制度保障，將藍圖變為現實的執行力、具備了融入國家大局的戰略視野、預備好服務國家所需的能力擔當，就是香港送給自己「三十而立」的一份大禮。



# 汲取內地經驗 主動識別精準扶貧

管浩鳴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202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這一奇跡背後，是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將對弱勢群體的扶持從小規模、補貼式的「社會救濟」，成功演變為一套系統化、制度化國家戰略的經驗。

日前，特區政府公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不僅是對扶貧工作的階段性總結，更是「一國兩制」條件下，特區政府合理吸納內地治理及施政經驗、制定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扶貧策略。

## 幫扶有需要家庭

國家自2020年出台《關於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的指導意見》以來，普遍建立並實施了動態監測機制，重點關注有大病重病、重度殘疾、失能高齡等特殊群體的家庭，確保「早發現、早干預」。在國家的「十五五」規劃綱要中，防貧與幫扶工作更被置於戰略高度，如第二十七章第三節強調「完善常態化幫扶機制」，第四十三章第三節則提出「健全社會救助體系」。

這些經驗為香港提供了重要啟示。過去，香港的扶貧政策往往流於單一「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常規計算，容易陷入「越扶越貧」的數字遊戲，且缺乏主動「對症下藥」的功能。特區政府近年吸納了國家「精準識別、動態監測、分層分類」的治理精粹，將扶貧的思維從傳統的單純金錢接濟，轉向「主動識別、精準扶助」的新模式，與國家扶貧方略一脈相承。

為了讓扶貧的成果具體化、直觀化，報告不再被局限於單一貧窮線，而是引入了更科學、更立體的「多面向分析框架」。透過7個面向、共21個宏觀指標，從收入、經濟活動及就業、受惠於現金社會福利情況，以至於居住環境、成長、教育、健康等多元層面作出比對分析，立體地反映基層實況。報告更進一步引入「社會資源價值」概念，將經常開支中本港住戶所能獲得資源的部分，量化成受惠住戶平均每月所獲得的收入，直觀呈現特區政府代基層家庭承擔的實質生活開支。

運用大數據分析 運用大數據進行深度分析的機制背後，特區政府辨識出全港當中最需要幫助的三大目標群組，立體地剖析其痛點與困難，並對其進行了精準施策。譬如，劏房住戶居住環境狹窄且租金負擔重，部分家庭生活捉襟見肘，不利兒童成長和學習。「單親」住戶照顧兒童而無法全身投入職場，在育有幼子女的家庭中尤為普遍。全長者住戶身體機能及活動能力逐漸下降，人際互動和社會參與相應減少，對日常照顧與精神關顧的需要日益增加。對此，特區政府通過對比分析，精準鎖定各群組內的重點幫扶對象，並針對性梳理其困難與需求。

在2026至2027年度，特區政府投放於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的預算經常開支已超過3,500億元，佔政府整體經常開支約六成。其中教育佔1,023億元，醫療佔1,189億元，社會福利1,359億元，而房屋方面的公共開支則為645億元。如此龐大的資源投放，正是為了發揮「保障」與「促進向上流動」的雙重功效。報告的發表，證明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完全有能力將內地行之有效的施政經驗，轉化為適應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治理工具。透過革新跨界別協作制度、深化政商民三方合作，特區政府正利用數據與成效為基層家庭拓展向上流動的空間。這有力地回應了國家對港澳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精準扶助弱勢群體的期盼，更切實提升了香港市民的「幸福感」與「獲得感」，為香港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基礎。



# 美伊對峙破冰 但仍面臨考驗

何志平



6月17日，美伊雙方同步公布內容基本一致的諒解備忘錄文本，標誌着兩國軍事對峙與博弈進入階段性緩和和周期。隨後美伊代表團21日在瑞士比爾根山舉行首輪談判，圍繞停火止戰、解除制裁、搭建合作過渡框架，以利益置換實現雙邊止損。其間一波三折，伊方曾因抗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言論憤而離場。據22日最新消息，美伊經過18小時談判達成了協議文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進展」，包括建立進一步技術性會談的機制。美伊緊張局勢及全球能源危機，終於迎來一絲和平曙光，但維繫信任及履行承諾仍是最大考驗，以色列是其中最大變數。

根據卡塔爾和巴基斯坦發布的聯合聲明，各方同意成立高級別委員會，負責對調解工作進行政治層面的監督，並就60天內達成最終協議的路線圖達成一致，且成立一條溝通渠道，以保障商業船隻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各方又同時就黎巴嫩問題建立「衝突降級小組」，伊朗「石油和石化產品出口獲得豁免，封鎖被解除，部分資產被解凍，並啟動了一項重大的伊朗重建和發展計劃」。

## 特朗普承壓下作讓步

伊朗方面幾乎未做任何讓步，而美國則在近乎所有方面都作出重大退讓。這說明特朗普在國內外壓力，尤其中期選舉臨近之下，已別無選擇。更反映出美國軍事霸權從絕對主導轉向相對受限時代，多極化力量在地區事務中更顯着，單極霸權難掩衰落，並將對同盟體系、權力機構、經濟命脈、技術競爭、非傳統安全及社會輿論等維度產生長期連鎖影響，中東秩序進入碎片化博弈與區域戰略自主並存階段。

目前協議雖然達成，但需要履行60天，才有機會進入終戰協議階段。當中最大變數則是以色列會否聽從美國的指揮，並放棄對黎巴嫩的攻擊。20日凌晨，以色列國防軍再次對黎巴嫩南部發動炮擊。黎方指控，以軍不僅使用常規武器，還動用了白磷彈和集束炸彈，把戰場拉向國際公約中都屬於高度敏感甚

至被禁止範疇。伊朗對外明確強調黎巴嫩停火對伊朗至關重要，是美伊談判的「決定性」因素。換句話說，以色列不收手，伊朗就不買美國的賬。在大眾印象中，美國手握巨額軍援、安理會否決大權，是以色列的超級靠山。只要白宮出手干預約束，以色列便會迅速收兵停戰、順從美方安排。但事實並非如此。

## 美以各懷鬼胎

戰事初期，美以目標相同，均以遏制伊朗核計劃、削弱其地區影響力為由發動聯合打擊。特朗普最初默許以色列的激進主張，意在藉以色列之手打壓伊朗，穩固美國中東霸權。但隨着戰爭延續，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國際油價攀升，美國國內通脹壓力加劇、民眾反戰情緒高漲，特朗普的戰略訴求發生根本轉變。盡快結束戰爭、達成可向選民交代的協議，才是契合美國利益的選擇，這與以色列目的形成尖銳對立。只要美伊談判出現實質性進展，以色列就會攪局破壞，精準施壓美方高層。在數次關鍵節點，以色列已直接打亂美伊和平進程。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執意擴大戰事，一是迎合國內鷹派主張，趁美軍參戰藉機實現「大以色列」擴張構想；二是視伊朗為生死存亡的最大威脅，目標遠不止遏制核計劃，而是徹底摧毀其政權、清除其導彈能力及黎巴嫩真主黨等「抵抗軸心」勢力；三是他深陷國內貪腐醜聞，政治生命與強硬對外軍事態度高度綁定，一方面戰火不止等於護身符、審判無限延後，另一方面既能轉移國內矛盾、鞏固執政地位，也是利庫德右翼集團當下最優的政治與利益選擇。為阻止美國抽身，以色列不惜「戰略綁架」，頻頻擴大軍事行動，刻意激化地區矛盾，破壞美伊談判節奏，令美國騎虎難下。

「棋子綁架棋手」，特朗普的撤軍意願與內塔尼亞胡的主戰進攻形成死結，令美伊停火安排及和平協議的全面落實依然撲朔迷離。眼下美伊對峙暫時破冰，但未來美國能否真正體面結束對伊戰爭，不僅考驗特朗普政府的決策智慧，更關乎中東格局的走向與國際秩序的穩定。

# 當好超級增值人 創造價值把握中亞機遇

席春迎 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代表團訪問中亞，引發了香港工商界和資本市場的廣泛關注。如果放在全球經濟格局重構的大背景下觀察就會發現，李家超此行釋放出一個重要信號：香港正在開啟面向中亞乃至全球新興市場的新階段，其國際化發展路徑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 中亞擁龐大年輕消費群體

過去幾十年，香港最大的成功在於連接內地與歐美成熟市場。然而，隨着全球經濟重心逐步由大西洋向歐亞大陸轉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全球增長版圖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香港未來的發展空間也正在從傳統成熟市場向新興市場延伸。在這一過程中，中亞正逐漸成為香港必須重點布局的新方向。

中亞是一個資源富集的地區，是連接東西方的重要通道。隨着區域經濟持續增長、人口結構不斷優化，以及數字化進程加速推進，中亞正在從「一帶一路」的通道經濟轉變為「一帶一路」的市場經濟。從戰略價值看，中亞最大的吸引力不僅在於資源，更在於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潛力。

首先，中亞擁有極具戰略價值的資源稟賦，包括石油、天然氣、鈾礦、銅礦以及稀土資源。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和新能源時代之後，全球競爭的底層邏輯，由過去圍繞製造能力展開競爭，轉為圍繞能源供應、安全資源以及關鍵礦產展開競爭。無論是算力基礎設施建設、電動車產業發展，還是未來人工智能產業擴張，都離不開能源和資源保障。中亞在這一輪全球產業重構中擁有獨特優勢。

與此同時，中亞人口結構相對年輕，消費升級剛起步。從發展階段看，某種程度上與20年前的東南亞具有相似性。隨着城市化率提升、中產階層擴大以及數字經濟普及，中亞未

來有望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新興消費市場之一。

## 內地所長正好符合中亞所需

更重要的是，中亞當前最迫切需要的領域，恰恰是內地企業最具競爭優勢的領域。從數字經濟、電子商務、金融科技到智慧城市建設，從新能源開發到水務環保治理，中國企業經過過去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和成熟的解決方案。對於中亞國家而言，他們不僅需要資金，更需要技術、管理經驗和產業生態，而這正是內地企業能夠提供的核心價值。

如果從更宏觀的視角觀察，內地企業出海實際上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過去二十年，內地企業出海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產品出海，即向海外銷售商品和設備；第二個階段是產能出海，即建設工廠、產業園區和海外製造基地。今天，內地企業正在邁向第三個階段，即資本、技術、標準和生態體系的整體出海。

未來內地企業輸出的將不僅僅是一件產品、一套設備或者一個項目，而是一整套產業解決方案，包括技術標準、產業鏈協同能力、數字化管理體系以及資本支持體系。這種出海模式對國際化平台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香港恰恰具備獨特優勢。

香港最大的價值是擔當「超級增值人」，展現高水平的價值創造能力。未來香港的競爭力，不在於簡單地把內地企業介紹給海外市場，而是在於能夠創造新的價值，使內地與海外市場的聯結實現質的提升。

首先，隨着內地企業進入中亞市場，項目融資、跨境貸款、債券融資以及產業基金需求將持續增長。香港能夠利用自身國際金融中心優勢，為內地企業和中亞項目提供全球資本配置服務。

與此同時，香港還具備發展成為「一帶一路」跨境併購中心的重要條件。未來圍繞能源、礦產、高科技以及基礎設施領域的大型併購交易很可能在香港完成。香港擁有成熟的專業服務體系，可為併購進行法律架構設計、安排融資及執行交易。

## 香港要打造風險控制平台

在全球地緣政治環境日趨複雜的背景下，風險管理能力也將成為香港的重要競爭優勢。普通法體系、國際仲裁機制、保險服務以及合規管理體系，都是內地企業走向國際市場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對於進入中亞市場的企业而言，香港不僅是融資平台，更是風險控制平台。

除此之外，香港還應進一步發展成為國際產業服務中心，包括市場研究、產業對接、法律服務到人才支持和運營管理，覆蓋企業國際化全過程。

有企業認為，中亞市場雖然廣闊，但只有大型企業才能參與。事實上，與中亞聯通，未來真正受益的未必是規模最大的企業，而更可能是擁有核心技術和專業能力的專精特新企業。

無論是人工智能、智慧水務、新能源、智能製造還是醫療科技領域，中亞市場都存在大量細分需求。中亞需要的並不只是下一個華為，也需要大量能夠解決具體問題、滿足具體場景需求的專業企業。在數字化轉型和產業升級過程中，這些企業反而更容易找到自身定位和發展空間。回顧過去四十年，香港最大的成功在於連接內地與世界。展望未來二十年，香港新的歷史使命則可能是連接內地與全球新興市場。中亞只是這一戰略布局的起點，未來還將延伸至中東、東盟、非洲和拉美等更廣闊區域。

在新的全球競爭格局下，真正決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未來地位的，不再只是資本規模，而是資源配置能力。香港需要從「超級聯繫人」角色轉化為「超級增值人」，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迎來下一個黃金十年。